

当代德国女性的传统角色超越

——伽比·豪普特曼女性小说的人物塑造

邵思婵

(浙江大学亚欧语言文学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德国当代著名女性小说作家伽比·豪普特曼于近年创作的三部女性小说《找一个阳痿男人过日子》(1995)、《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1996)和《床上的谎言》(1997),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小说以两性冲突为中心,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和间接描写等手法,塑造了一系列“追求和谐的两性关系”、具有坚强意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德国新女性形象。伽比·豪普特曼在女性小说中塑造了具有强者性格的尼娜、卡门和乌尔苏拉,正感应了德国主流的审美心理,她所创作的女性小说因而也成为统一后德国文学中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

[关键词]当代德国女性;传统角色超越;伽比·豪普特曼;女性小说;人物塑造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1-0104-07

伽比·豪普特曼(Gaby Hauptmann)是德国当代著名的女性小说作家。她近年所创作的三部女性小说《找一个阳痿男人过日子》(1995)、《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1996)和《床上的谎言》(1997),在德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98年,这三本小说的合订本发行,总销售量高达200万册。称这些小说为女性小说,是以德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曼弗雷德·尤尔根森(Manfred Jurgensen)所作的定义为依据的。曼弗雷德·尤尔根森说:“一个女人,她作为女人有意识地描写自己(同时也与性有关),描写出一种不同的命运,她创作的就是女性文学。一个女人,她有一种明确的意识,为妇女的事业起战斗作用,那么,她创作的就是女权主义文学。”^{[1](p.19)}伽比·豪普特曼的女性小说是以男女冲突为中心的,但与德国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控诉男性压迫”为主旋律的战斗的女权主义文学不同,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追求和谐的两性关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女性的形象。

女编辑尼娜供职于她丈夫斯文担任部门领导的一家私人电视台,生活阔绰,但她对自己的境遇并不满意,因为斯文阻碍她在事业上的发展。尼娜毅然决然冲破家庭的樊篱,去追求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和生活。女记者卡门不满意同居男友彼得对她的纠缠,在报上刊登启事,意欲觅一个阳痿男人过日子。当她真爱上海滩男子大卫后,又不辞劳苦地为他求医治病。丈夫突然死亡的家庭主妇乌尔苏拉面临公司被人廉价收购的困境,但她不畏艰险,以丈夫的“强者”风范为榜样,终于转危为安,不仅使公司的规模扩大,而且还意外地抓到了谋害她丈夫的凶手。伽比·豪普特曼在女性小说中塑造了三个超越了传统女性角色的新女性形象。

伽比·豪普特曼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论是尼娜、卡门,还是乌尔苏拉,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收稿日期]2002-03-20

[作者简介]邵思婵(1946-),女,浙江慈溪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亚欧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德国文学研究。

和民族的精神特质。她们所扮演的角色超越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她们所经历的个人奋斗历程,反映了即将进入21世纪的德国女性争取社会地位以及在家庭生活中争取男女平等的生存状态,在她们实现完美、和谐人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强、执著、永不言败的强者的精神特质,正是德意志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

那么,究竟什么是“传统的女性角色”呢?所谓“传统的女性角色”,是指由父权制社会按照男人的愿望所设计出来的女性的画像,它被定义为“家庭妇女—母亲义务—性的受支配”(1)(p.85)。早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欧洲就开始了对女性、女性教育和女性角色的讨论。从法国启蒙活动家卢梭一到法国大革命后一些撰写妇女教育小册子的作者都认为:“妇女在精神上、道德上天生就是下等的,因此就需要男性权威的保护。”(2)(p.75)德国学者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发表的《性别的角色理解》是与当时资产阶级的社会模式及其实际要求相一致的。洪堡于1795年在席勒的《时序》(Horen)上发表《关于性别差异及其对人的影响》和《关于男性和女性的形式》两篇文章,就是从实际的教育意图出发来写的,并视之为人类教育的基石。在文章中,洪堡使用二元论的“形式—材料的模式”来解释男女两性。他认为,男人体现的是“形式的原则”(2)(p.114),即精神自主的、独立的和教育的原则;女人则代表“材料的原则”,即感性的、被动的、须被教育的原则。格尔达·亨利希(Gerda Heinrich)指出,回溯到一种哲学史的传统中,这种形式—材料的模式是以抽象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统治—奴役的关系”(2)(p.114)。德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和作家克利斯蒂安·奥泽尔(Christian Oeser 1791—1850)从席勒的美学理论中接受了女性象征着“和谐”的观点,以及从其他美学理论汲取的与女性产生联想的自然、妩媚、美丽、美德、伦理,以拔高理想的女性。而在另一方面,奥泽尔却贬低女性的理智、思维能力和意志力。总而言之,女性(Weiblichkeit)这个概念给予妇女以男人心目中理想的特征,美丽、妩媚、美德、伦理等,都被认为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画像,并且有着一种宣布妇女对这个社会是无能为力的作用。“每个理智的和真正有教养的女子的美丽、伟大和特有的职业当然就是当妻子、家庭妇女、母亲。作为妻子使丈夫幸福,作为温柔和忠实的母亲甚至放弃消遣生活的所有刺激,在静静的家庭圈里传播家庭的满意和幸福。”(2)(p.103)在一本为妇女写的会话词典中,奥泽尔如是写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某一种教育的可能性。在一本《女性行为的准则》中,作者则鼓励女子去关照艺术、珍品和美,但她们的艺术爱好不能越过家庭的界限。她们有了艺术鉴赏力,可以把家里布置得温馨,使丈夫感到舒适满意。对这种“传统的女性角色”提出质疑的,首先当推英国的玛丽·沃尔斯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为妇女的权利而辩护》(1792)一书中,玛丽呼吁人的自然权利也对占人类一半的妇女有效。她反对当时时代的主流思想,反对卢梭认为女子生来属于下等的观点。她指出:“为了两种性别的人的完善和一种普遍的自由平等制度的建立,父权制中的专制统治必须被废除。”(2)(p.75)玛丽要求女子享受一种平等的教育,要求在公众生活中,妇女享有就业和从政的可能性。在英国晚期启蒙运动时期,玛丽等学者针对性别的不等价值即性别歧视指出,“同现存的阶级社会、权力结构一样,她们把父权制也理解为是专制统治。这种父权制统治腐蚀妇女,异化了她们的自然本性,像所有受压迫的牺牲者一样,妇女成了‘依赖别人、卑躬屈膝、懦弱的和奴隶般思维的生物’”(2)(p.75)。在当时具有“市民解放”特点的德国,特别是在18世纪的下半叶,也有一些女作家参加这场讨论。她们的作品受到读者的赞赏,索菲·拉·洛赫(Sophie La Roche)就是其中一位。索菲创作的小说《冯·施泰恩海姆小姐的故事》(Geschichte des Fräuleins von Sternheim 1771)塑造了一个超越“私人的、家务的”(2)(p.169)范围,挣脱了当侯爵小妾的命运而最终成为教育者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一个教育下层青年女子成为善良和灵巧的女仆的女子。从这部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当时妇女解放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伽比·豪普特曼在她的小说《床上的谎言》(Die Lüge im Bett 1997)中,就是从对“传统的女性角

色”的超越中塑造了新女性尼娜的形象的。尼娜正在考虑与她丈夫斯文离婚,但是她害怕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因为她不清楚她的顶头上司斯文对离婚会作出何种反应。斯文当领导,她在职业上就看不到前途,因为斯文虽给她布置任务,却又阻碍她的晋升。尼娜已29岁,然而离她“三十而立”的目标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远。“他不给她机会!”辞职,搬出斯文的家就会有成就!〔3〕(p.8)尼娜为此来到母亲家里。尼娜母亲发表意见说,爱情在生活中不是那么重要;还有其他的价值存在。你的斯文事业有成,英俊潇洒,慷慨而诚实。通过他你得到了一份好工作,一套漂亮的住宅,有人照顾你。最终你嫁给了他!难道他不曾是你的理想丈夫吗?在床上你把他当成你的理想丈夫就行了么!〔3〕(p.13)尼娜睁大了眼睛反问道:“当成理想丈夫?你对父亲也是这种态度?就凭想像?”〔3〕(p.14)尼娜不能苟同这种“床上的谎言”,她不能接受她母亲这种依附男人丧失自我的生活态度,她要改变现状,摆脱一种在日常生活、工作和性生活中受丈夫支配的被动地位,从一种“依赖性的爱情童话”中解放出来,成为有独立思维、自主行动的行为主体。尼娜果断地提出与斯文离婚,当即被斯文粗暴地赶出家门。她没有投靠父母,而是住进了价格低廉、散发着马粪味的旅馆里。尼娜在物质生活上虽然一落千丈,但她要从男权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她懂得经济上的独立对于确立女性人格的意义。被她的坚决态度所打动,一家小店的老板娘聘用了她。伽比·豪普特曼描写了尼娜寻找工作的曲折经历和打工的艰辛劳累,表现了尼娜独立走向社会生活的坚定决心。在女友的帮助下,尼娜终于在“妇女电视台”重新当上了编辑。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4〕(p.78)尼娜为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感到由衷的快慰,因为她的“自我实现”这一最高需要层次得到了满足。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它们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尼娜已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说尼娜“超越”而不是“背叛”了传统的女性角色,是因为女性离不开为人妻为人母的命运。虽然尼娜并没有生育孩子,但她对失足青少年的关爱之心足以表现她有着母亲般博大的胸怀。尼娜在慕尼黑遭到一个16岁男孩的袭击,后脑出血以至昏迷,当她醒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挽救失足青少年,使他重新做人。伽比·豪普特曼以生动的笔触刻画出尼娜的人类关怀之情,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已经远远超越了私人的、狭小的家庭范围。

男女婚姻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性生活。伽比·豪普特曼在女性小说《找一个阳痿男人过日子》(*Suche einen impotenten Mann fürs Leben* 1995)中处理的是男女性生活的题材。传统的女性角色无疑在物质生活上依附男人,在性生活中是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而小说主人公卡门在家庭生活中要力争性生活的平等、自由,她渴望和谐的性生活。可以说,这是女性继争取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中男女平等后的又一个截面,由此可以看出女性的独立意识和男女平等已达到很高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根据男女关系可以判断整个文明程度。〔5〕(p.7)当今德国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高,已清楚地反映在小说中。卡门在报上刊登了要“觅一个阳痿男人过日子”的启事后,翌日就收到了四封回信。在与几个男子的交往中,她最后选择了大卫。什么原因呢?卡门对80高龄的邻居老太艾尔维拉袒露心迹说:“大卫满足我的一切——一个男人能够允诺的一切,他并不总是把性放在重要位置,以至使其他的一切如和谐、喜悦、狂欢都必须取决于性。〔6〕(p.199)卡门进而说出了她对性的观点:“男人们认为如此重要的和相信是重要的东西,相信这是对女人们最重要的东西,而在女人对男人的评价中却完全是排在后面的。〔6〕(p.201)由于卡门和彼得对性所持的不同观点,导致了矛盾和冲突,尽管彼得说他仍然爱着卡门,但卡门执意要离开他。因为卡门所追求的,正如她对艾尔维拉所说的:“我最终要在一种和谐、幸福的两性关系中生活,没有讥讽,没有强制,没有纠缠,我要的就是这,这就是我的目标!”〔6〕(p.74)卡门真的爱上了大卫,于是千方百计找心理医生、

找秘方为大卫治病。从卡门刊登“觅阳萎男人过日子”的启事,到不遗余力为大卫治病,再充分不过地证实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4〕(p.78)

伽比·豪普特曼以女性的视角,细腻的笔触,简洁、通俗的对话和轻松、幽默的风格,塑造了一系列追求全面的身心解放的新女性。在伽比·豪普特曼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德国自然景色的描绘,但却有着十分厚重的德国气息。这就是女作家通过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传递给读者的。最典型的性格人物就是她在小说《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Nur ein toter Mann ist ein guter Mann 1996)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乌尔苏拉(Ursula)。无论是尼娜、卡门还是乌尔苏拉,在她们身上都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尼娜竭尽全力终于从斯文手中争取到去巴西拍摄青少年电视片的机会,但在巴西前往警察局常住处的途中遭遇抢劫,尼娜回旅馆取拍摄器材后坚持再次去见警察局长,体现了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在这部《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的小说中,伽比·豪普特曼塑造了一个铮铮硬骨的乌尔苏拉形象。丈夫虽死,但她“时时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7〕(p.142)。她把床头柜上嵌有瓦尔特照片的银色镜框拿在手里,对瓦尔特说:“有时我甚至有种感觉,突然在我身上有了你的一部分。然后我看任何东西都是用你的眼光。”〔7〕(p.81)乌尔苏拉坚强、果断地主持公司的工作,终于挫败了对手的阴谋,不仅反败为胜,而且还找到了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丈夫死后,乌尔苏拉有机会走出家庭,实现了“角色的更换”,她继承了丈夫坚强不屈的精神,因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了成功。而在丈夫生前,在她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她认为她丈夫严峻、坚强,对她没有一丝温存和情爱;只是在丈夫死后,她才深深体会到丈夫所具备的坚强意志的难能可贵,所以,乌尔苏拉才发出了“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的由衷感慨。很明显,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丈夫死了,客观上给了她从家庭园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契机;二是丈夫的坚强意志是她取得成功的法宝。从乌尔苏拉对她丈夫刻骨铭心的怀念中可以知道,在她心目中丈夫并没有死,丈夫的精神是永恒的。这部小说的前面部分几乎可以说是关于“强者”的箴言录,我们不妨摘录几段以飨读者:乌尔苏拉与乌威在圣诞节准备出海航行,帆船已经启航,天幕低垂,呈铅灰色,像水一样,海上笼罩着暴风雨前的宁静;“瓦尔特天气”,乌尔苏拉想。“安慰和鼓励不属于她的强大。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去斗争,才属于她的强大。这是她从瓦尔特那里学来的。”瓦尔特始终在权力中有感觉,他能轻易地关掉感情。当他单独登山或扬帆出航时,当他与自己、与大自然搏斗时,他不知畏惧、不知疲劳、不知疼痛。她不知道,当他站在山顶时,或平安到达港口时,他是否真的感到幸福。他总是立即又有一个新的目标在眼前。”“瓦尔特曾向她解释过世界的秩序,在自然界就是这样,一个赢,一个输。胜者是他,瓦尔特——手中握着武器。那边的那个人(指乌威),没有行动能力,没有坚强意志,没有自己的意志,与瓦尔特相比,是零,什么也不是,根本不存在。”乌尔苏拉寻思着〔7〕(p.42)。一句话,瓦尔特的强大表现在“性格的强大,贯彻实施的能力,毫无顾忌和自我控制”〔7〕(p.27)。强者的性格,就是德意志民族最本质的性格特征。这种强者性格在法西斯专制下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人民为敌;这种强者性格在摆脱了法西斯统治后走向和平建设,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奇迹”;这种强者性格在柏林墙倒塌后不出一年,便实现了两德的重新统一。伽比·豪普特曼在她的女性小说中塑造了具有强者性格的尼娜、卡门、乌尔苏拉,正感应了德国主流的审美心理,她的女性小说也因此成为统一后德国文学中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

伽比·豪普特曼在人物塑造上的第一个特点,是把“两性冲突”仅局限在单个家庭之中,小说女主人公在家庭生活中处在两性冲突之中,但这并不影响她们去追求自己所钟爱的男子。德国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奇迹”促进了原西德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的那种“学校—结婚—家庭妇女”的生活轨迹受到了挑战,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表现性别冲突为主要题材的德国女性主义文学和

女性文学,忠实地记录了西德妇女逐渐从男权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趋势。伽比·豪普特曼没有像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女权主义者那样,把两性冲突扩展为与整个男性世界的冲突,从而使早期的德国女性文学成为“控诉男性统治”的文学,因而在言语中也充满了“仇恨男性”的愤怒声调,而为了解决冲突与矛盾,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把搞同性恋看成是一条出路。因此,有评论认为,早期女性文学就像是“一首对父权制的专制、对异性爱的屈辱和两性间不可能交际的控诉之歌”[8] p.86)。安格拉·普雷森特(Angela Praesent)1979年对此开出的诊断是“在生活危机中孤陋寡闻”[8] p.86)。于是,许多女作家到世界各地旅行,这使得她们观察世界的目光变得更加敏锐。女性文学的“孤岛时代”过去了,变成了一片有“异国情调”的陆地,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重新回到男人身边”的女性文学题材和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将两性冲突局限在单个家庭中,也是20世纪90年代德国女性小说的特征之一。

伽比·豪普特曼在人物塑造上的第二个特点,是运用心理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从女性的视角,细腻、逼真地描写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塑造出既有感情、又有理智的真实可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尼娜在巴西拍摄电视片时,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制片导演涅克。在商讨拍片内容时,涅克微笑着对尼娜说:“你出个主意吧!”尼娜的脑海立即翻腾起来,千言万语化成了一句话,那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嗯”,尼娜克制着内心汹涌澎湃的激情冷静地回答说:“我们自己去寻找拍片地点、确定采访日期。”[3] p.43)一天,拍摄组一行驱车到海滨浴场,尼娜寻思着:“为何她不能与涅克单独地躺在一个地方,去享受海浪轻柔的冲刷?不,她必须正视现实,她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涅克……”当她以为坐在酒吧的涅克在向她招手时,心里高兴得乐开了花。女作家是这样描写尼娜当时的感受的:“噢,狂喜!噢,幸福!他要她到他身边去!此刻的尼娜也正神采飞扬地要跑到他那里去,刹那间,她却像生了根似的站住了。原来,涅克不是向她,而是朝苏珊娜挥手,他还吻了苏珊娜的脸颊,这太过分了!尼娜两眼满噙着泪水。”[3] p.54)依照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理论,尼娜的感觉是一种本能,它属于“无意识”或“本我”。“本我”是心理的第一个层次,是指动物性本能的冲动,是一种原始的冲动;“本我”遵循的是“快乐”的原则,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海滨浴场回到旅馆后,涅克来了;“尼娜的思绪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了涅克的房间、浴室,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因此,她不再往下想。管他追不追求她,这有什么关系,这世界上还真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呢……”[3] p.61)弗洛伊德认为,心理的第二层次是“自我”;“自我”遵循的是现实的原则,即按照客观实际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自我”像是一个把门人,不让“本我”往外跑。所以说;“自我”代表人的理性,使人具有正常的人格。显而易见,尼娜受过良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具有完备的人格,能用理智战胜感情。心理的第三个层次,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理论,是“超我”,这是指人的伦理道德准则、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超我”不断地协助“自我”,使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伽比·豪普特曼就以这三个层次为序,塑造出有血有肉、精神充实、形象丰满的女强人尼娜。伽比·豪普特曼通过尼娜歌颂了人道主义思想,并对社会进行了批判,这无疑拓宽了女性小说的深度和广度。人道主义思想是18世纪以来德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统一后的德国,读者从伽比·豪普特曼的女性小说中看到了德国人民对“人道主义理想”的追求。尼娜去巴西拍青少年的电视片,她亲眼目睹三个青年背上条条伤痕渗出的血迹,巴西青年向尼娜带领的摄制组讲述他们受迫害、遭毒打、受酷刑的悲惨遭遇以及骑兵中队的恐怖行为。尼娜与她的同事们颇有感触地说:“里约热内卢不只是阳光和光屁股,这只是三级剧院的侧幕而已。”[3] p.60)这是德国年轻一代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的揭露,言语简洁但一针见血。在巴西,尼娜采访一位名叫坦娅的社会工作者,肯定了她帮助街头流浪儿童的工作,她说:“确实,我很羡慕你做的事情。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贡献出您的力量,这是有意义的,您一定能达到您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人道主义。”[3] p.59)而尼娜自己

也身体力行，挽救过一个曾袭击她的青年。

伽比·豪普特曼在人物塑造上的第三个特点，是使用间接描写法，烘托、反衬主人公坚强、果断的性格特征。女作家通过对乌尔苏拉与威廉的妻子列娜优柔寡断的对比描写，突出了乌尔苏拉铁一般硬的性格特征。乌尔苏拉在了解了要阴谋整垮她公司的威廉的情况后，便去拜访威廉的妻子列娜。她劝说列娜与丈夫离婚，然后将公司卖给她，再找一个自己真爱的男人开始新生活。

“已经 50 岁的女人？”列娜问道。

“难道您要等到 80 岁不成？”乌尔苏拉反问道。

“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我要原原本本地告诉您，您丈夫这几年都做了些什么。我相信，您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本来我也不想听这些。不久前我与他之间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7〕（p. 242）

乌尔苏拉答应用公道的价格来收购列娜的公司，列娜同意了。翌日预签合同，列娜来得很迟。她说：“我感到害怕，我没有勇气。”我不知道，如果他回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签好合同后，列娜要求有人陪她回家，乌尔苏拉开着车送列娜回去。凌晨 3 点，还不见威廉的影子，黎明时分，威廉才摇摇晃晃地回到家，没想到看见了乌尔苏拉。“早安！瓦弗尔先生！我已经签合同了！”乌尔苏拉平静地说。“噢，从哪里……合同在哪里？”威廉朝前走了三步。乌尔苏拉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将合同递给威廉·瓦弗尔。“这是一份预签合同”，乌尔苏拉补充说。威廉起初不明白，接着便大发雷霆，他用手指着乌尔苏拉，并攥着拳头狠狠地朝桌上捶去。他对妻子说：“你不能赶我走，我要你完蛋，完蛋，完蛋！你这个老无赖，看看你自己，你这个失效的挤奶机器……”威廉对他妻子百般辱骂，列娜一言不发。乌尔苏拉发话了，她说：“也许您对这个感兴趣。”接着给他看正式合同的复印件。威廉看罢，对着列娜大叫：“你真卖掉了公司？”卖给了她，我诅咒，我！我！我！你把一切都搞糟了，你会受到惩罚，你这个笨蛋……”面对威廉的狂暴，乌尔苏拉冷静以对，她不许威廉继续侮辱列娜，便插话说：“我们以为，这样你有更多的时间去陪比安卡。”威廉朝乌尔苏拉冲去，一边吼道：“滚！滚！否则我要动手了！这屋有五个出口，您自己找一个，马上滚蛋！”乌尔苏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这是我的家，威廉〔7〕（p. 269），列娜终于向丈夫发出了逐客令。伽比·豪普特曼如此生动地描绘了乌尔苏拉与威廉的斗争，而这仅仅是刻画女主人公坚强性格的一幕而已。

伽比·豪普特曼这几部小说的命题看似荒谬，实则却有几分真理性，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的一种新思维、新手段，即所谓的广告效应。它不求四平八稳，不讲逻辑性，要人心跳，引人注意，引起轰动。作家绝非要诅咒所有的男人，而是通过小说说明女性与男性一样，除了要有生存空间，还要有发展空间。“女性求发展”就是这三部女性小说的主题。伽比·豪普特曼女性小说成功的人物塑造向世人生动地展示了德国女性生活的精彩片段，实现了当代德国女性对传统角色的超越，赋予了女性以角色全新的时代注脚，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德国特色。

[参 考 文 献]

- [1] Manfred Jurgensen (Hrsg.). Frauenliteratur[M]. München :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 1985.
- [2] Inge Stephan , Sigrid Weigel , Kerstin Wilhelm(Hrsg.). Wen kümmert 's , wer spricht[M]. Köln , Böhlau Verlag Köln Wien , 1991.
- [3] Gaby Hauptmann. Die Lüge im Bett[M]. München : Piper Verlag GmbH , 1999.
- [4] 恩格斯.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四卷[C].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72 , 1 - 175.
- [5]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9.
- [6] Gaby Hauptmann. Suche Impotenten Mann fürs Leber[M]. München : Piper Verlag GmbH , 1999.
- [7] Gaby Hauptmann. Nur ein toter Mann ist ein guter Mann[M]. München : Piper Verlag GmbH , 1999.
- [8] Hubert Spiegel. shopping in Mailand , ja ja ja[A].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 Ein Bücher-Tagebuch 1998[C]. Frankfurt am Main :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GmbH , 1998 : 84 - 88.

The Surpassing of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German Women

SHAO Si-chan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Europe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Gaby Hauptmann , a famous female novelist of contemporary Germany , produced three female novels — *Suche impotenten Mann fürs Leben* (1995) , *Nur ein toter Mann ist ein guter Mann* (1996) and *Die Lüge im Bett* (1997) — which reached a high level in both thought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 With sex conflict as the center of the novels , the author created a series of new , strong-willed German female characters who were “ looking for harmonious sex relations ” and seeking self-actualization through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and indirect description .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 id is the first one of the three divisions of the psyche that is completely unconscious and is the source of psychic energy derived from instinctual needs and drives . Ego is the second one of the three divisions of the psyche that serves as the organized conscious mediator between the person and reality especially by functioning both in the perception of and adaptation to reality . And superego is the third one of the three divisions that is only partly conscious ; it represents internalization of parental conscience and the rules of society , and functions to reward and punish through a system of moral attitudes , conscience , and a sense of guilt . Through these divisions , Gaby Hauptmann created vivid Nina of strong character , through whom he praised humanitarian thought and criticized the society . That opened up a new horizon for the writing of female novels . Humanitarian thought has been a fine tradition of Germ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th century . Readers in unified Germany may find from the novels German people pursuing a humanitarian ideal and the exposure and criticism of the essential exploitation aspect of capitalist society b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 The character of the Strong is basically the one of German nationality . It was this character that led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under the fascist despotism , which made Germany the enemy of the whole world . It was this character that worked “ economic wonder ” during the peaceful construction in the 1950 's after the end of the fascist rule . And it was this character that brought about the unification of two Germanies within one year afte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 Therefore , the three strong characters of Nina , Carmen and Ursula portrayed by her responded to the esthetic psychology of the general German public . Her female novels became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phenomena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as a result . Absurd as the theme of the novels is , it actually contains some truth . It is a new idea and a new approach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 which will render an advertising appeal . It will give readers a surprise and cause a sensation . The author doesn 't mean to damn all men at all . Instead , she wants to tell that besides living space women also need developing space as men do . “ Women striving for development ” is the theme of the three novels . With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German women , the successful creation of characters by Gaby Hauptmann demonstrates the wonderful episodes of their life and the surpassing of their traditional character .

Key words : contemporary German women ; the surpassing of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 ; Gaby Hauptmann ; female novel ; creation of characters